

孙明君◎著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

中华书局

孙明君◎著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 / 孙明君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7

ISBN 978 - 7 - 101- 07388 - 1

I . 两… II . 孙… III . 文学史 – 研究 – 中国 – 晋代
IV . I209.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0)第 074316 号

书 名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

著 者 孙明君

责任编辑 张 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630 × 960 毫米 1/16

印张 22½ 插页 2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07388- 1

定 价 56.00 元

前 言

2004年5月，笔者获得了题为“两晋历史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阅读古代典籍和近代以来学术大家的论述之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门阀士族问题是深入把握两晋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关键所在。从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先生到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无不强调了这一点。内藤湖南先生指出：“要言之，在六朝时期，贵族成为中心，这是中国中世纪一切事物的根本。在它未发生变化和解体之前，就是中国的中世纪社会……在这一贵族时代发生的各种文化现象，如经学、文学、艺术等等，都具备了这一时代的特征。这时期的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根本，今天的中国文化也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建筑起来的。”^①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也提出：“门阀一

前
言

① 日本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第311页。

端乃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有关之大问题。”^①钱穆先生说：“魏晋南北朝时代之门第，当为研究中国社会史与文化史以及中国家庭制度者必须注意，亦自可不待言而知。”^②从门阀士族的角度去研究两晋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

所谓士族文学是指以士族文人为主体所创作的，内容上具有鲜明士族意识，在艺术上体现出士族阶层审美倾向的文学作品。两晋是士族文人最为活跃的时代，他们是文坛的主要势力，他们的思想情感可以左右文坛走向，他们的审美风尚可以引导时代潮流。所以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两晋时代可以看作士族文学盛行的时代。在两晋之前的汉魏时代和之后的南朝时代，虽然也有一些士族文人创作的体现出士族意识的作品，但他们不能主宰文坛的走向，他们的作品不能代表时代的主旋律。从这个角度说，只有两晋可以称之为士族文学时代。此前的汉魏时代是士族文学的萌生期，后此的南朝则是士族文学的式微期。

由于本书涉及到文学、史学、政治学等学科范畴，这就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本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有：第一，文学与历史、哲学相结合。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开创的方法，就是从研究社会思潮、生活习俗、文人心理入手去研究文学，也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文学。朱自清先生明确说：“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许多学科做依据，主要是史学，广义的史学。”（林庚《中国文学史·序》）文学的存在也是历史的、思想的存在，要研究一定时代的文学必须要通晓这一时代的历史与思想文化。无疑，从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角度去把握两晋士族文学的内涵，是深化士族文学研究的重要途径。第二，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人文科学的研究常识告诉我们：学术研究的质量首先取决于学术资料的真伪。因此任何学术研究都应该以文献作为基础。倘若没有扎实的文献作基础，所谓的学术研究只能成为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 55 页。

②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三，第 186 页。

空中楼阁和过眼烟云。第三,微观分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如果没有微观分析做基础,一味追求所谓的宏观把握,所得出的结论必然大而无当,脱离史实;倘若一味沉溺在微观分析中,没有宏观研究的眼光,其结论必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微观分析与宏观把握相互结合才是学术研究的唯一正途。只有把一位作家、一个时段的研究,放置在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认识,才能认识其规律,揭示其内涵。是故,本书在研究方法上重视文史哲学科的结合,重视文献资料的考索,重视历史发展的源流,力求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探查两晋士族文学。

全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概论篇,包括士族及两晋士族、两晋士族文学研究综述、两晋士族文学之特征、两晋士族文学之嬗变、“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析论等章节。第二部分为分论篇,主要是对两晋士族文学中的重要诗人与作品展开具体析论,如陆机的《文赋》与士族文学创作论、陆机与士族乐府之范型、二陆赠答诗中的东南士族、兰亭雅集前后的会稽士族、谢灵运的庄园山水诗、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研究等。第三部分是附论篇,对与本课题相关的一些两晋文学之外的问题展开评介与析论,其中包括谢朓《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释证、庾信诗赋中的士族意识、陈寅恪士族理论述评、黄节与汉魏六朝诗歌之笺注、日本学者六朝诗歌研究一瞥等内容。

为了便于读者诸君阅读,谨将全书主要结论介绍于下:

1. 所谓士族乃是指:第一,出身于在正史中有明确记载的门第之家;第二,其父祖中有当朝公卿大夫;第三,本人在文化方面具有高深的造诣。本书在判断一位诗人是否属于“士族”时,除了上述三个特征外,对个别难以确定身份的士人,看他是否与其他士族诗人群体过从甚密,被士族诗人们视为该士族群体中的一员,同时,判断士族文人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他的创作中是否具有一定的士族意识。
2. 所谓士族意识乃是该作家之创作具有强烈的门第观念和鲜明的贵族志趣。
3. 所谓士族文学是指士族文人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一般而言,士

族文学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在思想上以反映士族意识为中心；第二，在艺术形式上追求新变，体现士族阶层的审美风尚；第三，由于士族文人通常以群体形式出现在文坛上，同一个群体内的作家之作品风格也具有一定的共同性。

4. 两晋士族文学之嬗变历程：第一个阶段是西晋时期，这个阶段有两个士族群体活跃在洛阳地区，一个是中原士族群体，代表人物是潘岳和石崇；一个是东南士族群体，代表人物是陆机陆云兄弟。两个群体之间有一定交往，二陆兄弟都参加了贾谧的“二十四友”集团。第二个阶段是东晋中期，这个阶段活跃在文坛上的是侨姓会稽士族群，代表人物有孙绰、王羲之、谢安等人。此期盛行玄言诗。第三个阶段是东晋末期及刘宋初年，此期活跃在文坛上的是谢氏家族群体。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的领袖人物是谢混，后一段的代表人物是谢灵运。此期山水文学开始兴盛。

5. “庄老”与“山水”是东晋士族文学中的两重主题，在永和时代“庄老”与“山水”的关系表现为“以玄对山水”，到了义熙—元嘉时代，“庄老”与“山水”的关系表现为“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庄老”与“山水”之间的动态关系形成于兰亭诗人。“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不是一次诗界革命，仅仅是一次士族审美情趣的转移。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皆以士族意识为其底色，属于士族文学的不同板块，士族玄言诗与士族山水诗内在相通。形成这一现状既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士族阶层审美风尚的转移相关。

6. 陆机的《文赋》是一篇创作论，它涉及到了创作构思、创作方法、写作技巧、创作灵感等一系列问题。从士族文学的角度看，陆机的《文赋》是一篇具有明显士族意识的创作论。士族意识并不是陆机创作论中的点缀，而是其创作论中的精髓。陆机《文赋》中的士族意识不仅体现在思想内容方面，也渗透在艺术形式方面。从思想内容方面看，陆机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及儒家诗学观中渗透着家族意识；从艺术形式方面看，陆机所倡导的“丽藻”审美观带有士族阶层的特色；陆机“雅而艳”的

文学观念,不仅开启了六朝士族文学,而且影响了整个六朝文学的走向,但它与宫体诗之间又有着质的区别。

7. 魏晋文人乐府大致有三种类型:一为曹操乐府;一为(曹)丕(曹)植乐府;一为陆(机)谢(灵运)乐府。曹操乐府乃英雄的乐府,其诗中的忧患意识、天下襟怀,千古一人;曹丕曹植乐府乃文士乐府,子桓乐府多吟人生之忧,子建后期乐府多咏失志之痛,在后世文人中最容易引起共鸣;陆机谢灵运乐府乃是士族文人乐府,其声誉隆盛于中古之时,沉寂于明清之后。太康时代,陆机把文士乐府引入到士族文人乐府的范围之中。陆机不仅用绮靡的风格去改造旧经典,同时,用乐府记录和再现了贵族们的物质生活,表现出具有士族特色的功业追求。在六朝这样一个门阀士族异常兴盛的时代,陆机乐府比三曹乐府更具有典范性。

8. 魏晋是一个赠答诗兴盛的时代。东南士族文人群体赠答诗表现了生活在北方社会中的东南士族群体的南人意识和士族意识,以及他们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他们既有建功立业、克振家声的激情,也有急流勇退、回归故土的渴望;这个群体之间具有亲如手足、相濡以沫的“阶级”情谊。和邺下文人集团的赠答诗一样,二陆与东南士族赠答诗具有独特的诗史价值。

9.《兰亭序文》是王羲之所作,不是后人的依托;《兰亭序文》未能入选《文选》在于其自身的白璧之瑕;《兰亭序文》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生动再现了会稽士族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关于“达”与“未达”的问题,会稽士族在文学上艺术上是“达”的,在政治上也追求“达”。但在经济上,在士族的利益上,他们并不旷达。

10. 谢灵运的山水诗可分为庄园山水诗和远游山水诗两大类型。在所有山水诗中,庄园山水诗最能体现他的士族意识。贵族别墅的兴盛不仅为山水诗的兴起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庄园区域的山光水色也成为诗人审美的对象和诗歌表现的主体,庄园山水诗是古代山水诗的一个分支。如果没有始宁庄园这样的山墅园林,虽然不能说就不会产

生谢灵运的山水诗,起码可以说如果剔除了描绘别墅区域的山水,谢灵运的山水诗将会黯然失色。在中国诗史上,谢灵运是第一位用心描写庄园山水的诗人,而且庄园山水在他的整个山水诗中占有很大比重。庄园山水诗更加典型地表现了士族阶层的审美情趣,开拓了山水诗的格局和诗境,对中国古代山水诗产生了广泛影响。

11. 学术界对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以下简称《拟邺中》)写作动机的探究,主要有模拟说、隐喻说、再现说等。以上说法从不同的角度触及了谢灵运诗歌的内在意蕴——士族意识。《拟邺中》是谢灵运士族意识在模拟之作中的折射,它透露了士族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它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中古贵族生活的场景。与其说谢灵运在拟作中所表现的邺中生活是一段让人心仪的历史追忆,不如说它是士族心目中的乌托邦世界。

12. 谢灵运的《拟邺中》以建安时代邺下诗人为模拟对象,成功地模拟了曹丕记忆中“欢愉之极”的生活,但是,在拟诗中诸子放弃了各自的理想,安于享乐生活,同时诗人也忽略了曹氏父子与邺下文士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从而,我们认为《拟邺中》并不完全符合史实。可以说,邺下之游是存在于曹丕脑海中的完美记忆,而谢灵运却将它扩大为一个时代一个精英群体的集体性完美记忆。

13. 关于谢灵运的《拟邺中》的写作年代,目前主要有三种看法。1)《拟邺中》的写作与谢灵运和庐陵王刘义真的交游相关;2)完成于谢灵运生命的最后几年,即元嘉八年(431)前后;3)作于早岁摹拟用功于五言诗时期。笔者认为谢灵运《拟邺中》完成于义熙十一年(415)前后。理由如下:第一,六朝时期,模拟的风气兴盛。一般来说,用功摹拟的情况,大都发生在青少年时代。第二,义熙十一年至义熙十二年(416),谢灵运集中创作了多首给同族兄弟的赠答诗。此与《拟邺中序》中的情感大体吻合。《拟邺中》当与以上家族诗完成于同一时期。第三,从现存作品看,在谢灵运四十九年的人生中,山水诗的写作开始于永初三年(422),这一年诗人三十八岁。在此之前很少有山水描写。《拟邺中》中

山水描写成分不仅很少而且质实朴素,不似后期所作。

14.《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是谢朓的代表作之一,前人认为它抒写了谢朓对随王子隆的深情厚谊。经过对相关史实的考察,笔者认为:永明十一年冬天,谢朓从早年的倾心子隆,转变为“阿附齐明”。写作《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之时,虽然在个人情感层面谢朓对随王子隆具有一定的依恋之情,但在政治层面已经决定要为西昌侯萧鸾集团效劳。笺中所包含的内容有三:一是追忆自己与随王子隆之间的旧情;二是宣告自己将在政治层面与随王子隆彻底切割;三是希望随王子隆在春天时离开荆州,回到京城建康来。纵观古今论者,由于大家的关注只在第一点,相对忽略了后两点,从而也可以说未能真正把握《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一文的要旨。

15.庾信诗赋中的士族意识不仅表现在他强烈的家族观念和对萧梁士族群体境遇的描写上,同时也体现在他后期的创作中。庾信后期的政治生命中有两大矛盾:一是故国之思与歌颂北朝;二是隐居与出仕之间的徘徊,这一切皆源自庾信强烈的士族意识。而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功名,耀祖光宗,则是庾信一生不曾放弃的追求。

16.关于庾信《哀江南赋》的写作年代,20世纪以来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六种之多,可归结为北周前期说(鲁同群、胡政)、北周中期说(王仲镛、牛贵琥、林怡)和北周后期说(陈寅恪)。其中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影响最大,许多通行的文学史著作皆采用此说。在前修时贤的启发下,据笔者的初步考证,庾信《哀江南赋》当创作于北周明帝元年(557)至明帝武成二年(560)之间。

17.陈寅恪先生的士族阶级理论乃是有别于人民阶级观的另一种思想观念。运用士族阶级观可以看到人民阶级观所忽视的一些历史现象。在中国中古门阀士族盛行的时代,士族阶级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集团。陈寅恪先生的士族阶级观对于提醒学术界对于门阀士族的重视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不宜将士族阶级的历史作用过分夸大。士族阶级的门风似乎不宜用“优美”予以概括,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之

间的斗争并不是阉宦阶级与士族阶级之间的较量。

18. 黄节先生不仅善于写诗而且善于注诗,同时也是一位仁人志士,在他身上志士、诗人、学者始终融为一体。黄节先生对汉魏六朝诗歌的笺注“取材宏博,态度谨严”,是 20 世纪古籍整理、研究中的典范之作。其“以古注古”的方法,“于事不敢妄附,于志则务求其明”的治学态度,以诗救世的精神在新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中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队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阵。一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学者,二是西方世界的学者,三是亚洲地区汉字文化圈内的、中国周边国家的学者。日本学者处在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之间,他们无法抹去从古代就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历史痕迹,不论是江户时代的汉学也好,还是后来的东洋学、中国学也好,他们在世界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阵。回顾过去,日本学者在中国六朝文学研究方面也和其他领域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两晋士族文学内容庞杂,涉及面广泛,作者才疏学浅,课题研究又有结项时间上的限制,是故,目前提交给读者诸君的书稿,一定存在不少问题,希望得到大方之家的教正。

目 录

前言 1

概论篇

第一章	士族及两晋士族	3
第二章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综述	15
第三章	两晋士族文学之特征	34
第四章	两晋士族文学之嬗变	55
第五章	“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析论	77

分论篇

第六章	陆机《文赋》与士族文学创作论	95
第七章	陆机与士族乐府之范型	109
第八章	二陆赠答诗中的东南士族	130
第九章	兰亭雅集前后的会稽士族	146

附 有关《兰亭序文》真伪争辩之述评 168

第十章 谢灵运的庄园山水诗 178

目
录
1

第十一章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 研究	191
附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作年考	211
附论篇	
第十二章 谢朓《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释证	219
第十三章 庾信诗赋中的士族意识	237
附 庾信《哀江南赋》作年辨正	269
第十四章 陈寅恪士族理论述评	279
第十五章 黄节与汉魏六朝诗歌之笺注	305
第十六章 日本学者六朝诗歌研究一瞥	320
征引书目	336
后记	342

概 论 篇

第一章

士族及两晋士族

门阀士族是中国历史中的特殊产物，它对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早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近代以来，对于门阀士族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从内藤湖南先生到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都作了强调。士族阶层是魏晋时代极为重要的一种社会势力。士族与非士族的分界看似简单，其实颇为复杂。哪些士人属于士族阶层？哪些士人不属于士族阶层？哪些朝代属于门阀制度时代？士族阶层是否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各个阶段有什么样的特征？凡此，学术界向来有不同的理解。在进入士族文学研究之前，有必要从史学的角度界定“士族”之范围，梳理士族之发展历程。

一 士族的界定

与“士族”相近或相同的词语有数十种之多，毛汉光先生说：“两晋南北朝正史，以及后来学者对该期间累世官宦家族之称呼，共得

二十八种。曰高门；曰门户；曰门地；曰门第；曰门望；曰膏腴；曰膏粱；曰甲族；曰华族；曰贵游；曰势族；曰势家；曰贵势；曰世家；曰世胄；曰门胄；曰金张世族；曰世族；曰著姓；曰右姓；曰门阀；曰阀阅；曰名族；曰高族；曰高门大族；曰士流；曰士族。上列二十八种称呼，所指意义小异而大同，由于各人对同一事实所着重之点不同，遂有名词上的差异。”^①在毛先生看来，虽然这其中也有指家门贵盛者、有指身份华贵者、有指权势显赫者、有指家族绵延者、有指姓氏观点者、有指社会地位者、有指家族声名者、有指政治文化者，但都是对同一社会阶层的不同称呼。唐长孺先生指出：“‘势族’和‘世族’在当时虽有密切的关系，有时可以互通，但毕竟不是同义语。”^②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学者在以上 28 种称呼中，使用最多的还是强调累世为官的“世族”和强调文化素养的“士族”两种称呼，本书以为在判断个体士人身份和文学成就之时，比起士人的累世为官的门第来，还是其自身的文化素养更为重要，是故本书选择了“士族”一词。

一般地说，所谓士族乃是指由地主阶级中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家族所组成的一个特殊阶层。然而，正如唐长孺先生指出：“士庶从来有别，但是怎样才算士族却缺乏明确规定。”^③目前影响较大的分类法有如下数种：

1.《新唐书·柳冲传》中记载的唐人柳芳的分类：

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

柳芳将士族分为五类 26 家，这种划分立足于唐代，并不符合两晋时代的实际。东南“吴姓”指三国时期吴国的高门士族，他们在西晋时

①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 141 页。

② 唐长孺《唐长孺文存》，第 136 页。

③ 唐长孺《唐长孺文存》，第 305 页。